

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講義

中央民族學院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教研室
蘇聯專家維·符·列文柯

第十章

共產黨爲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而鬥爭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時期）

蘇聯共產黨實現着偉大列寧所製定的，並經過科學論證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綱領，進入了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時期（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

在這個時期中，蘇聯人民克服了國內和國際方面的巨大困難，保證建立了重工業基礎。這種重工業能夠以新的技術來裝備全部國民經濟。

蘇聯工業化的方法和蘇聯共產黨爲實現工業化而進行的鬥爭，有巨大的國際意義。蘇聯的經驗教導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共產黨，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取得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勝利的鑰匙。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各人民民主國家建成社會主義的基本方法和客觀的必然性。

因此，研究蘇聯爲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而鬥爭的經驗，是黨的一個重要任務，並且也是各人民民主國家建成社會主義的重要條件之一。

蘇聯共產黨爲實現國家社會主義的工業化而鬥爭這一章計劃分成四講來講，在第一、二講裏我

們要講社會主義工業化時期中的困難以及克服這些困難的鬥爭。

第一——二講

社會主義工業化時期中的困難和克服這些困難的鬥爭

這兩講計劃要講下面幾個問題：

- 一、黨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後爲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而鬥爭；
- 二、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時期中的困難和黨爲克服這些困難而鬥爭；
- 三、外國帝國主義者破壞蘇聯工業化的企圖；
- 四、黨爲反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而鬥爭及該聯盟的失敗；
- 五、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際意義。

一 黨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後爲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

工業化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而鬥爭

大家都知道，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確立了黨和蘇維埃國家的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總路綫。因此，蘇維埃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就進入了新經濟政策的一個新時期，即進入了工業化的時期。

在順利完成恢復時期的任務以後，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政策成爲可能了。恢復時期的任務首先是振興農業，從農業方面取得原料和糧食，使工業動作起來，——恢復工業，恢復現有的工

廠。如果沒有振興農業並運用農業市場、糧食和原料的先決條件，就不可能恢復和發展工業。一九二五年底，工業已接近戰前水平，這只是因為它依靠着日益發展的農業、依靠着農民市場日益擴大的容量，也是因為它適應於農民市場的需要。

新經濟政策第一個時期（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的情況就是如此。在這個時期的條件下，蘇維埃政權比較容易地執行了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

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採取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針以後，蘇聯進入了新經濟政策的第二個時期。現在，國家經濟政策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一點，就是重心已轉到了工業方面。在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時期，因為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是依靠着農業，所以我們必須從農業開始，現在，爲了要繼續建設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要推進整個經濟，所以必需的正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工業上。現在，農業本身如果沒有必需的物質技術基礎——沒有農業機器、拖拉機、工業品等等，就不能進展。

斯大林說過：「因此，如果當時，在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時期，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事業是依靠農業的，那末現在它却要依靠而且已經依靠工業的直接擴展了」（「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一一頁）。

但是，並不是發展任何一種工業都能算做工業化。工業化的實質並不是在於工業的單純增長，而是在於發展重工業，首先是發展工業的中心——機器製造業，因為只有建立重工業和本國的機器製造業，才能保障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才能使社會主義國家擺脫資本主義世界而處於獨立地位。

如果蘇維埃國家自己不能生產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如果它使國民經濟受制於那些生產並輸出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那末它在經濟上就不能擺脫資本主義的包圍。

黨牢記着偉大列寧的指示，即如果沒有重工業，就不能捍衛國家的獨立；如果沒有重工業，蘇維埃制度就會滅亡；重工業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

列寧說道：「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民經濟收成豐盛還不夠，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情況興旺也還不夠，——我們還要有重工業……」

「……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根本不能維持我們之爲獨立國家的地位」（「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第九八九頁）。

由此可見，蘇聯的工業化不能只了解爲發展任何一種工業，比如說，發展輕工業，雖然輕工業及其發展也是我們所絕對必需的。正如列寧事業的繼承者斯大林所教導的，「工業化首先應當了解爲發展我國的重工業，特別是發展我國自己的機器製造業這一個工業的神經中樞。否則就談不到保證我國在經濟上的獨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一一三頁）。

共產黨遵循着偉大列寧關於全力發展大機器工業和電氣化的學說，製定了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具體綱領。國家工業化的歷史性綱領，在一九二六年黨中央委員會四月全會的決議中和斯大林「關於蘇聯經濟狀況和黨的政策」的報告中，得到了體現。斯大林的這個報告是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給列寧格勒黨組織積極分子做的。

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的具體任務是什麼呢？

第一，必須在新的技術基礎上來改造恢復時期復工的那些舊工廠。這些企業由以技術陳舊落後，很快就要變成無用之物。

第二，必須擴大工業基地，建立用現代技術裝備起來的新工廠。必須「從新創立沙俄時代所未曾有過的許多工業部門，——必須建立新的機器製造廠，機床製造廠，汽車製造廠，化學工廠和冶

金工廠，必須創立本國製造發動機和電站裝備品的生產，必須增加金屬和煤炭開採量，因為這是爲保證蘇聯社會主義勝利而絕對必須的」（「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七二頁）。

第三，必須爲農業建立工業基地。社會主義在農村中勝利的利益要求，「必須建立拖拉機製造廠和現代農業機器製造廠，並用這種工廠的產品供給農業，使千百萬細小的個體農莊能過渡到大的集體農莊的生產」（同上）。

第四，「必須創立新的國防工業，——建立新的大砲製造廠、砲彈製造廠、飛機製造廠、坦克製造廠和機關槍製造廠，因為這是加強我們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環境中的蘇聯國防能力而絕對必需的」（同上）。

第五，必須在各民族共和國建立工業基地，以便迅速地消滅在發展中後進的各族人民事實上的不平等。

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綱領的主要具體任務就是這些。

共產黨所製定的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綱領，規定了新的、各文明國家歷史中所未曾有過的、蘇維埃的工業化方法。這種新的、蘇維埃的工業化方法，是與資本主義工業化方法根本不同的。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工業化通常都是從發展輕工業開始的，但是蘇維埃國家是不能採用這種工業化方法的，因為它意味着蘇聯的滅亡。所以共產黨摒棄了這種『通常的』工業化方法，而開始從擴大重工業來實現國家工業化事業。「黨知道戰爭日益迫近，沒有重工業就無法保衛國家，所以必須趕快着手發展重工業，假使這件事稍遲一着，那就等於失敗」（「斯大林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選區兩次選民大會上的演說」，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第二六——二七頁）。

蘇維埃的工業化與資本主義工業化根本不同的地方還在於，資本主義工業化是自發地實現的，是資本家追求利潤的結果；社會主義工業化則是爲了滿足勞動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而在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實現的。

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結果是加強對農工的剝削，是奴役殖民地各族人民，是加深城鄉之間的矛盾；相反，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結果是消滅失業現象，增加實際工資，全部國民經濟的不斷高漲，城鄉的接近，工農聯盟的鞏固和過去各後進民族地區經濟和文化的高漲。

蘇維埃的工業化方法的最大優越性就在於，它是依靠生產資料公有制，是依靠工農勞動所創造的財富的積累和儲蓄。

蘇維埃的工業化方法的使命，是要在短時期內使蘇聯變成一個強大的工業國。

二 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時期中的困難和黨爲克服這些

困難而鬥爭

要想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綱領就需要大量的投資。但是，蘇維埃國家在當時還沒有大量的資金，同時也不能指望借用外債，因爲資本主義國家拒絕借款給蘇聯。這樣就只好不要外國幫助而專靠本國資金來從事建設。因此，國家工業化的投資問題，是主要困難之一。

歷史上有過三種爲發展工業積累資金的來源。英國的工業化是靠掠奪殖民地來實現的。德國由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對法戰爭的勝利而加速了自己的工業化。當時德國向法國人索取了五十億法郎的賠款，把這筆賠款投入自己的工業。沙皇俄國竭力依靠奴役性的租借和在受奴役的條件下取得外

債來爬上工業化的道路。

很明顯，蘇維埃國家不能採取奪掠殖民地，從戰敗國人民方面取得賠款和在受奴役的條件下借外債這樣一些辦法來作爲工業化資金的來源。所有這些工業化的資金來源都是和蘇維埃國家的性質和政策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必須尋找另外一種國家工業化的資金來源。

偉大的列寧曾不止一次地指出過，蘇聯工業化資金的唯一來源就是內部的社會主義積累。這種積累來源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設想的。

第一，十月革命從地主和資本家手中奪取過來的並變成了公有財產的工廠、土地、銀行、運輸業、商業等等，就是爲發展工業的社會主義積累的雄厚來源。現在，國家工廠的積累，運輸業、商業和銀行的積累，已不是用於供給各寄生階級耗費，而是用於繼續擴大工業了。

第二，蘇維埃政權使國家免除了向外國支付沙皇政府所訂借的外債的利息，過去爲償付這種外債的利息，每年就要付出八—九億金盧布。

第三，蘇維埃政權既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消滅，就使農民免除了每年必須向地主繳納的約五億金盧布的地租，現在，農民因爲擺脫了這個重担，所以能夠幫助蘇維埃國家來創立新的強大的工業。農民是切身需要獲得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的。

所有這些積累的泉源使蘇維埃國家有可能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所不可缺少的後備力量。

但是，只有積累還不能算是完全解決了工業化事業。任務在於正確地利用積累起來的資金，合理、節儉地支出這些資金。必須做到「使人民的財產一個錢也不白費，使積累主要用在滿足我國工業化迫切需要的方面」（「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一一九頁）。

蘇維埃國家的共產黨始終不渝地執行了正確運用積累和在使用資金方面厲行嚴格節約制度的政

策。

黨做到了使工業計劃不是按照官僚主義的臆想來製定，而是密切聯系國民經濟的需要和國內市場首先是農民市場的需要來製定。同時，工業計劃決不能夠脫離積累的來源，也就是說，應當依照資金來製定工業計劃。正確而合理地製定工業計劃是適當利用積累的必要條件之一。

黨在工廠裏開展了消滅曠工的運動，並為提高勞動生產率、鞏固企業中的勞動紀律展開了廣泛的運動。在爭取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鞏固勞動紀律的鬥爭中，為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創造了新的、補充的後備力量。

黨精簡國家機構和合作社機構的工作，在正確利用積累的事業中，有着極重要的意義。一些管理機關機構臃腫，編制過於龐大，因而招致很大非生產的開支。黨堅決執行着精簡機構的方針，做到了不使社會主義的積累分散從而損害工業這一點。

同時，黨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來反對管理機關中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鋪張浪費現象。決不能容忍把幾萬甚至幾十萬盧布白白糟蹋在慶祝各種節日、舉行各種慶祝大會、紀念典禮、宴會等等上面。與機關中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鋪張浪費現象作鬥爭，就能夠保存我們的積累，以應工業的需要。

最後，與盜竊人民財產的不屑分子作鬥爭是有重要意義的，因為他們常常使社會主義積累遭到很大的損失。

黨為了保護社會主義積累和後備力量不被分散，不被貪污，為了使這些積累和後備用在國家工業化方面，而採取的措施就是這些。

蘇聯共產黨關於嚴格執行節約制度的要求，在共產主義建設的現階段裏也保留着它的一定意義。生產後備利用得愈充分、愈合理，社會主義生產進行得愈節約，愈省儉，國家在發展國民經濟

各個部門當中所取得的成就也就愈大，國家在提高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當中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愈大。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蘇聯部長會議最近公佈的「關於消除設計和建設中的浪費現象」的決議，表明蘇聯共產黨更加注意節約制度和合理地利用積累。

節約制度和縮減非生產的開支，也是各人民民主國家共產黨的經濟政策的最重要原則之一。正在實現國家工業化政策的中國共產黨是一貫遵循着這個原則的。

爲了實現國家工業化的方針，還須要有新的幹部，新的工業建設幹部。斯大林說道：「任何一種任務，特別是像我國工業化這樣的巨大任務，如果沒有活的人，沒有新的人材，沒有新的建設幹部，那就不可能實現」（「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一二六頁）。

任務是要在這個建設的過程中，從工人和蘇維埃知識分子——那些把自己的命運和工人階級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的蘇維埃知識分子——隊伍中間，造就出大批工業領導幹部。需要技術上有一定造旨的幹部，需要工廠經理、經濟機關和貿易機關的領導幹部等等。沒有這樣的人材，就不能在爭取實現國家工業化的鬥爭中前進。

爲了實現這些任務，黨中央通過了許多有關造就工業領導幹部的決議，採取了有關改善高等學校、中等技術學校及工農專科學校教學工作的措施，廣泛地建立短期訓練，如成組訓練和個別訓練，建立了提高生產中工長技術水平的訓練班等等。

黨和蘇維埃政府就像解決社會主義積累的問題一樣，非常堅決地解決了造就建設幹部的問題。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任務，如果沒有千百萬工人羣衆直接的和經常的支持，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黨的任務就在於提高千百萬工人羣衆的積極性，使他們成爲自覺的工業建設的參加者。斯大林說道：「需要使每個工人和每個誠實的農民都幫助黨和政府實行節約制度，對貪污和分散國

家後備的現象作鬥爭，驅逐戴着各種假面具的盜賊和騙子，健全並精簡我們的國家機關」（同上，第一二七頁）。

工人生產會議的使命是要在這方面起很大的作用。黨與輕視生產會議的現象展開了堅決的鬥爭，做到了使工業建設的基本問題成為生產會議注意的中心。

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政策不僅要求提高工人階級的積極性，而且還要求全力鞏固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黨經常關懷着工農聯盟的鞏固，同時，與列寧主義的敵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列寧主義的敵人把勞動農民羣衆看成異類，看成工業的剝削對象，看成工業的殖民地。

農民不僅是工業的市場，而且是工人階級在工業建設事業中的同盟者。正因為如此，農民經濟的提高，農民的普遍合作化，農民物質生活狀況的改善，就是一種前提，沒有它就不能保證工業大的發展。反過來說，發展工業，生產農業機器和拖拉機，以大量工業品供給農民，又是推進農業的一種前提。這就是工農聯盟極其重要的基礎之一。

由工人階級起領導作用的工農聯盟是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這種力量能保證克服工業化的一切困難。如果破壞了或削弱了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社會主義工業化政策就會懸在空中。

共產黨，這個由統一觀點、統一行動、統一紀律所團結起來的志同道合者——共產黨員的戰鬥聯盟，是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獲得勝利的決定性條件。黨在解決國家工業化任務的同時，一貫地執行着擴大黨內民主、提高黨員在討論社會主義建設基本問題時的積極性的方針。同時，黨與列寧主義的敵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列寧主義的敵人企圖以派別集團的自由來代替黨內民主，從而破壞黨的統一。

斯大林指出：「黨內民主就是提高黨員羣衆的積極性並加強黨的統一，加強黨內自覺的無產階

級紀律。……派別集團的自由就是瓦解黨的隊伍，把黨分裂為各個中心，削弱黨，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同上，第一三一——一三二頁）。

共產黨改組了各個黨組織的工作，活躍了蘇維埃和職工會的工作，鞏固了黨隊伍的統一和團結，因而能夠把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的積極性提高到新的、更高的階段，動員他們去克服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困難。

保證順利開展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的最主要前提和條件就是這些。

黨和蘇維埃政府順利地克服了積累資金方面的困難，收集起來供給國家工業化需要的資金一年多於一年。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投入工業的資金約近十億盧布，而經過三年就已有可能投入五十億左右了。

由於向工業投入了大批資金，於是就有可能來着手建設許多大型企業，如德品伯水電站，連接土爾克斯坦和西伯利亞的鐵路，斯大林格勒拖拉機製造廠，好幾個機床製造廠，斯大林汽車製造廠（『齊斯』）等等。

國家工業化的事業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穩步地向前進展了。

三 外國帝國主義者破壞蘇聯工業化的企圖

帝國主義者把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鞏固，看成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生存的一種威脅。因此，各帝國主義政府千方百計地企圖來破壞或阻礙國家工業化，他們把國際環境弄得很複雜，他們加強了反對蘇聯的間諜破壞工作。英美帝國主義者企圖建立一個反蘇統一戰綫，並企圖挑起對蘇聯的侵略戰爭。

一九二七年五月，盤踞在英國政府中的保守黨人（『硬頭派』）向蘇英貿易公司（『阿爾克斯』）舉行了挑釁的襲擊。二百名武裝警察佔領了『阿爾克斯』的辦公處，在沒有『阿爾克斯』代表的參加下，他們在那裏任意搜查了一晝夜。此後，英國保守黨政府就與蘇聯斷絕了外交關係和商務關係。

幾乎同時，美英帝國主義者挑起了張作霖的警察襲擊北京的蘇聯大使館。警察在大使館所有的房間裏和工作人員的俱樂部裏進行了搜查。在天津和上海也都發生了襲擊蘇聯領事館的同樣事件。所有這些挑釁行為，都是帝國主義者進攻蘇聯的總計劃的組織部分，而蘇聯却受到了中國人民的無限同情。

最後，一九二七年六月，有個加入波蘭國籍的俄國白衛分子卡威爾德在華沙刺死了蘇聯駐波蘭大使沃義可夫同志。現在，這個刑事犯和政治犯在美國取得了避難權。

同時，蘇聯境內有英美間諜和破壞分子放火燒工廠，並暗殺蘇聯人。破壞分子向列寧格勒黨俱樂部投擲炸彈，當時那裏正舉行着黨的會議，有許多人蒙難，有犧牲的，有受傷的。所有這些伎倆都是帝國主義者企圖挑起新戰爭的直接挑釁。

由於新戰爭威脅日益加強，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初發表了『告聯共（布）全體黨組織、告全體工農書』。中央委員會在這個文告中說道，工農應當隨時戒備着，注意着危險，準備着在任何時候去進行反擊。黨中央號召蘇聯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其產黨的周圍，為鞏固蘇聯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威力而忘我工作，以便打擊帝國主義者的武裝干涉企圖。

工人階級和全蘇聯人民用勞動英雄主義的新高漲來響應黨中央委員會的號召。勞動者發起了收集資金建立空軍中隊的運動來作為『我們對張伯倫的回答』。他們造成的飛機隆重地移交給了蘇聯

軍隊。根據黨和蘇維埃政府的決定，宣佈了『國防週』，它的目的是爲了鞏固和發展國防工業。

儘管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百般地施展挑釁陰謀，蘇聯仍然堅持不變的和平政策，這個政策受到了各資本主義國家勞動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帝國主義者建立反蘇統一戰綫的企圖破產了，因爲雖然有國家支持武裝干涉的路綫，但也有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想同蘇聯保持經濟和貿易的聯系。蘇維埃政府忠實而誠心奉行的和平政策，以及帝國主義陣營中日益加深的矛盾，打破了戰爭挑撥者企圖發動反蘇戰爭的全部計劃。

蘇維埃國家既已擺脫了帝國主義者挑釁的逼迫，也就克服了實行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中的一個補充困難。

四 黨反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的鬥爭及該聯

盟的失敗

外國帝國主義者的隱蔽的奸細和間諜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使黨和蘇維埃國家受到了不少困難。所以當時斯大林不爲無因地說過：爲反對蘇維埃政權而「結果便形成了一種從張伯倫起到托洛茨基爲止的統一戰綫」。

正當黨轉向實行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時候，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加強了他們的破壞工作。一九二六年夏，他們結成了一個反黨聯盟，把所有一切已被擊破的反對派集團餘孽團結在這一個聯盟周圍，並建立着他們那個反列寧主義的秘密黨的基礎。布爾什維克黨的敵人就這樣來橫蠻地破壞黨章以及幾次黨代表大會關於禁止成立派別組織的決議。

當時，在黨的面前擺着許多事實：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的擁護者已在舉行秘密會議，在翻印和散發秘密的黨的文件。事實證明，在莫斯科附近的森林中舉行的派別組織的會議上，有托洛茨基分子拉舍維契作了報告，叫囂進行反對黨和黨中央的鬥爭。季諾維也夫在其派別鬥爭中利用了他所領導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機構。結果，他通過這個機構，企圖來散佈那些已被布爾什維克黨斥責了的反對派觀點，以期為鼓動各兄弟共產黨起來反對共產國際的主導部分——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準備基地。同時，托洛茨基把各兄弟共產黨開除出來的反革命分子——柯爾什的『極左派』（德國）和蘇瓦林的『極右派』（法國）——結成了聯盟。這些集團瘋狂地攻擊蘇維埃政權，責備布爾什維克黨蛻化為富農。

一九二六年，黨中央七月全會揭露了托季聯盟的罪惡活動。黨中央全會警告說，這個與有名的孟什維克八月聯盟同類的反黨聯盟如不解散，那將對這個聯盟參加者作出一定的組織上的處置。全會解除了季諾維也夫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並開除了拉舍維契的中央候補委員資格，因為他們進行派別活動並違背了第十次及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

同時，全會決定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召集第十五次黨代表會議，以便解決已造成的黨內情況的一切問題。

反黨聯盟參加者不顧中央的嚴重警告，繼續進行他們反黨的破壞分裂活動。同年秋，在第十五次黨代表會議前夕，他們又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及其他幾個城市的黨員大會上實行襲擊，企圖強迫黨來進行新的爭論。他們還在這些會議上要求討論自己的托洛茨基孟什維主義的政綱，而這個政綱完全是反對列寧主義、反對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各項決議和反對國家工業化的。但是黨員們給了反對派分子一個有力的回擊，有些地方甚至老實不客氣地把他們逐出了會場。中央再次警告聯盟參加

者說，黨已不能再容忍他們所幹的破壞工作了。

這一次，反對派分子由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及索利里尼可夫等人簽名向中央提出聲明書，譴責他們自己的派別組織活動，並承諾說他們今後定對黨忠順。但是，這不過是指望用來麻痹黨的警惕性的一種兩面派手腕。事實上聯盟還是繼續存在着，聯盟參加者並沒有停止其破壞工作。他們繼續糾合他們那個反列寧主義的黨，組織秘密的印刷所，在自己同夥中徵收黨費，散佈自己的政綱。

一九二六年十月間召集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嚴厲地責斥了聯盟的頭目們所作的不能容許的派別活動，並再一次對他們提出了嚴重的警告。聯席會議解除了托洛茨基的中央政治委員職及加米涅夫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職。此外，聯席會議還解除了季諾維也夫在其產國際中的工作，因為他沒有在其產國際中執行黨的路綫，並因其進行派別活動，已喪失了各兄弟共產黨的信任。聯席會議確定了即將召開的第十五次黨代表會議的議程，以及斯大林『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聯盟』這一報告的提綱。

必須保護和進一步鞏固布爾什維克黨隊伍的統一，因而需要採取堅決措施來反對黨的敵人的破壞活動。不從思想上和組織上來粉碎托季聯盟，就決不能取得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勝利。

第十五次黨代表會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和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全會（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從思想上粉碎托季聯盟和鞏固黨的隊伍的統一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這兩個會議痛斥了托季聯盟的參加者，認為他們是已滾入孟什維主義立場、滾入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立場的分裂主義者。

在第十五次黨代表會議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會的各項決議中，在斯大林『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在第十五次黨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和『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

向』（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會上的報告）這兩個報告中，揭示了列寧主義黨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之間的原則意見分歧的深刻根源。並證明說，這些意見分歧是帶有綱領性質的。黨和反對派聯盟分歧的第一個問題，也是基本問題，是關於社會主義在蘇聯是否可能勝利的問題。

黨認為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它不僅是世界革命的信號、推動力和出發點，而且是在俄國建成完備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需的和充分的基礎。十月革命為自己開闢了一個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在這個過渡時期中，由於無產階級對農民採取了正確的政策，能夠而且應該勝利地建成完備的社會主義社會。但是，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可以完全勝利，只要資本主義包圍還存在和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危險還存在，就決不能把它和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混為一談，決不能把它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斯大林說過：「……我們都不能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已有免於外來危險的保障。所以要最後地取得勝利，必須努力使現在資本主義的包圍為社會主義的包圍所代替，必須努力使無產階級至少再在幾個國家內取得勝利」（「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三二——二三三頁）。

托洛茨基分子對蘇維埃革命的性質和前途，持着完全別樣的觀點。他們認為，十月革命本身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只是西歐社會主義革命的信號、推動力和出發點。他們認定，如果世界革命延緩和西歐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在最近期間內及時趕上，那末俄國的無產階級政權必將因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而倒台或蛻化。

組織十月革命的黨所依據的是列寧的指示，即社會主義能夠首先在不多幾個或甚至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單獨取得勝利的指示。黨所遵循的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不僅能夠保持政權，而

且他還能繼續前進，剝奪資本家和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以便有效地支持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者。

托洛茨基分子相反地認為，如果在一個國內已經勝利的革命未能於最近期內在別國引起革命的勝利，那末已獲得勝利國家的無產階級就不可能保持政權，至於組織社會主義經濟，那更是談不上了。托洛茨基分子硬說，在這種情況下，俄國的革命政權是不可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的。

由此可見，「在列寧看來，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是最積極最主動的力量，它能夠組織社會主義經濟，並且能夠繼續前進去支持其他國家的無產者。相反地，在托洛茨基看來，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會變成半消極的力量，它需要社會主義在其他國家內的立刻勝利作為立刻的援助，它覺得自己猶如宿營荒野，處在可能立刻喪失政權的恐怖之中」（「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二六頁）。

黨在着手解決建立社會主義基礎的任務時，所依據的是列寧的指示，即在蘇聯具有「為建成完備社會主義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

與此相反，托洛茨基分子硬說，只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各個重要國家內勝利以後，俄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才可能有真正的高漲。

黨所持的出發點是列寧的指示，即在工人階級與農民結成緊密聯盟的條件下，能夠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列寧指出，「正確對待農民一二十年就能保證世界範圍的勝利」（『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俄文版，第三〇二頁）。

托洛茨基分子却是從相反的說法出發的。他們認為，由無產階級去領導農民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基礎，那都是不能實現的事，因為工人階級必將碰到農民的敵對抗拒，而這些矛盾只有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舞台上才可能解決。

黨所持的出發點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反映出無產階級的民族任務和國際任務的一致；蘇聯